

最后的时光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你们看见我。”这是南仁东刚刚得病的时候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当时,他的学生、助理姜鹏只觉得这是句玩笑,不曾想,他就这么悄悄地出国看病,自己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5月15日,就在南仁东出国的前几日,姜鹏在电话里汇报完工作,突然问他:“老爷子,听说你要去美国?”他低沉的声音说:“是的。”沉默半晌后,他问:“你有时间回来吗?”姜鹏当时没有多想,就一贯的直来直去:“这边儿事太多了,我可能回不去。”

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成了诀别,成为姜鹏心头难以平复的遗憾。

在得知他已经离世的时候,姜鹏打开邮箱里南仁东的最后一封邮件,回复道:“老爷子,咱们还能聊聊吗?怎么感觉我的心情糟透了……”

“我特别不希望别人记住我。”他曾和家人说过这样的话。如今,这个洒脱的老爷子独自驾鹤西去,并留下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再谈起南仁东,他的学生、FAST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张海燕数度哽咽,泣不成声。她总以为自己还能再见到那个似乎无所不知、爱抽烟、嘴硬心软的老爷子,听到他在隔壁办公室喊自己的名字。而这些昔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如今却成了一种奢望。

“我们FAST人都非常非常敬重他。”FAST工程资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潘高峰告诉记者,在南老师过世之后,很多合作单位、评审专家都自发打电话来问候,为他的离去感到悲痛。还有人自发地在南仁东生前工作的办公室门口献上鲜花,有

“天眼之父”南仁东的人生告别

◆ 赵竹青 陈灿 王天乐

历经了22年的风雨,巨型“天眼”终于向世界睁开,让中国的射电天文学一举领先世界水平10到20年数十年。然而,就在“中国天眼”运行将满一年、首批成果即将出炉的时候,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72岁的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却悄然离去。这位“中国天眼之父”曾在FAST竣工落成当天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的经典回眸

人路过他的办公室时,会在门口鞠躬致敬。

处处为他人着想

“他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不讲究。”一位学生这么形容南仁东。

FAST工程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张蜀新对记者说,南仁东是一个很有个性、爱美的老爷子。他说,老爷子的审美很好,“你看FAST多漂亮。”

这样一个爱音乐、爱画画,常年留着小胡子、爱穿西装的“讲究人”,却是个相当随性的老头儿。他爱抽烟、爱喝可乐,还经常往西装口袋里装饼干,而又忘记拿出来,过段时间一看,全都成饼干末儿了。

他精干、率性、气场强大,姜鹏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一看他就是头儿,甚至有点像土匪头儿”。

他给学生发邮件都自称“老南”,也让大家直接这么叫他。而大伙儿私下里更爱喊他“老爷子”。

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身任FAST工程“总司令”的他竟成了现场与工人最好的朋友。同事们回忆,南仁东常常跑到工棚里和他们聊家长里短,他记得许多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干哪个工种,知道他们的收入,知道他们家里的琐事。他经常给工人带些零食,还和老伴亲自跑到市场给他们买过衣服。而工人们也完全不把他当“大科学家”,甚至直接用自己吃过的碗盛水给他喝,老南则把他们当家人一般不避嫌。

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善良,一心为别人着想的人。南仁东过70岁生日,学生们要给他庆祝,他只同意简单一起到园区餐厅吃了个午饭。他生病期间,学生们去看他,他说人來可以,什么东西都不许带。癌症治疗期间,他仍然坚持到办公室工作。他从不愿意麻烦别人,却经常带学生改善生活、操心他们的工作和发展。在贵州山区,他见到当地人生活的艰苦、上

学的不易,就自掏腰包给予他们资助。时至今日,仍有受助的学生给他写信。

最令姜鹏羡慕甚至有点“嫉妒”是,“老南”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年轻时,他曾利用大串联的机会跑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上山下乡的十年里苦中作乐,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后,又跑去荷兰求学,之后在日本工作当了客座教授,最后又为FAST回到了祖国。

对于这其中精彩的细节,姜鹏听得“如痴如醉”。一开始以为他在吹牛,慢慢发现不是这样——“我能求证的事情,他说的都是真的。”在姜鹏眼里,南仁东的人生充满着执着调皮、义气和随性、玩世不恭,甚至有些捣蛋,“太有意思了,我太喜欢了。”

FAST是他的生命

同事们都说,FAST是他用生命换来的。长时间的巨大压力,压垮了身体的免疫系统,令南仁东原本健

壮的身体不堪重负。

FAST是我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窗口”,让中国有了一个领先世界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面前,南仁东当仁不让,挑起了重担。

“这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FAST立项后,南仁东多次和我提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说不敢有半点疏忽,项目做不好没办法交代。”共事多年的老同学,FAST工程顾问、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道。

20多年来,南仁东始终以超强的责任感来应对超负荷的工作量,癌症发病后仍然坚持工作。这在斯可克看来,是一种不惜以命相搏的悲壮。

在FAST,南仁东是最勤奋的人,基本没什么节假日,每天都要处理上百封工作邮件。他常给同事们算一笔账:“如果因为工作没做好,FAST停一天,就等于国家白扔了12万。”这让一贯洒脱的南仁东也有了寝食难安、手足无措的时候。南仁东总是说,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姜鹏说,他不在乎名利,不然也不会放弃日本的高薪,对于院士的名头也相当淡然。“自从认识他以来,没见过他为任何事情低过头。但他自己却说,他低过头,就是为了FAST立项”。

2014年,馈源支撑塔开始安装,南仁东立志要第一个爬上所有塔的塔顶。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他真的一座一座都亲自爬上去了。回想起南老师在塔顶推动大滑轮的情景,FAST工程资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李辉不禁感慨:FAST就像是他亲手拉扯大的孩子一样,他在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拥抱望远镜。

在FAST竣工落成的当天,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望着“初长成”的大望远镜,憨厚地笑着,欣慰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摘自《人民网》

敦刻尔克



[英]约书亚·莱文/著 吴奕俊 陆小夜 王凌/译

3.我们决不投降

1940年6月4日晚,人们从广播里听到了首相丘吉尔当天早些时候在下议院的报告。这份报告没有逃避现实。丘吉尔提及,前有北部的德国装甲师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英军、法军和比利时军队,后有德军如“黑压压的兽群”一般的追兵。他提到军队的伤亡人数,提到无可计数的武器装备自此丢失。他承认,谢天谢地的是军队的成功撤离没有让英国忘记“在法国和比利时发生的其实是一场损失惨重的军事灾难”。

但丘吉尔同样说到,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场通过勇气、毅力、严明的纪律、完美的后勤、资源、技能、不可战胜的忠诚,来实现的救赎奇迹”。如果我们战败了都能如此,他不就是在暗示,我们能够成功么?接下来,他说他对英国有信心,面对德国的侵略,英国必能守卫每一寸土地,屹立不倒:

“我们会在海上浴血奋战,我们会以日渐高昂的信心与日渐壮大的空军浴血奋战,无论付出何种代价,我们必将守卫我们的岛屿。我们会在海滩上作战,会在敌人的登陆之地作战,我们会在田野和街巷里决一死战,我们会在山岭中与敌人死战到底,我们绝不投降……”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在英国激起了广泛回响,也暗示了英国前途艰险。在街巷和山岭中作战意味着德军可能登陆英国本土,英国将不得不展开游击战。除了这些,丘吉尔也暗示英国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不仅是在安抚英国人民,也是在向美国传递信息。丘吉尔说,我们会守住前线,直到你们与我们并肩作战。但请不要让我们等太久……

伦敦青年琼·西曼记得自己听闻敦刻尔克的败绩后惶惶不安。但当她听见丘吉尔的演讲,她的心态变了:“人们诽谤丘吉尔时,我总是说:‘是啊,但他让我不再害怕了!’”服役于英国皇家陆军勤务部队的乔治·普顿,刚从敦刻尔克死里逃生。虽然他无法认同丘吉尔对大撤退的观点,但当她听见首相的演说,他

知道这是“一流的政治宣传”。

6月5日晚上,另一则BBC广播让英国举国沸腾。小说家、剧作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列在新闻后发表了一则谈话。它比丘吉尔的演讲更平易近人,就像和朋友一起坐在沙龙酒吧喝酒后的闲谈。他用约克郡口音嘲笑敦刻尔克大撤退是典型的英国作风:必须在覆水难收前挽回滔天大错。他嘲笑德国人:他们可能没犯几个错,但也没能成就伟业。“他们什么都不是。”他说,“连让世界想象的空间都没有。”他眼中的英国人非常可爱、荒诞,又不切实际,这让他思想更加温暖。他用“最英国”的角度看待整个事件:快乐的小汽船依着召唤,离开筑着沙堡和有着薄荷味的石头的海边,进入遍布水雷和机关枪的恐怖世界。有些小汽船沉了,但他们自此永垂不朽:“而当我们的曾孙子、曾孙女,听见这场战争如何由撤退开始,最终走向胜利,获得无上的荣光时,或许也会明白,这些小小的假日汽船曾头也不回地驶向地狱,然后带着胜利返航。”

大部分英国民众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如何看待大撤退两周后新上映的戏剧揭露出来。由迈克尔·雷德格瑞夫主演的《雷霆岩石》在肯辛顿的邻里剧院上映。这部戏剧的作者罗伯特·阿德里称它是一部写给绝望之人的故事——很快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部戏剧如此流行,以至于英国财政部也愿意秘密给它资助。

剧情围绕一名记者展开,现代社会让他梦想破灭,他回到美国湖边的灯塔,开始隐居。在那里,他遇见一个世纪前为避祸而西逃的人们的鬼魂。他们有男有女,都在逃避自己时代的问题,最后都在湖中淹死。故事的主题在这位记者和鬼魂的对话中逐渐清晰:他们应该直面自己时代的问题,记者自己也不例外。最终,记者下定决心离开灯塔,重新回到战时的纷争之中。落幕前的一段独白里,他详细阐释了这个与现代观众息息相关的命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一天战火终将平息,投身战场,就是为了终结战争……我们注定要在旧的混乱中创造新的秩序……在新世界里,压迫、失业、饥荒和战争,都将和灭绝的瘟疫一样不复存在。这就是我们为之而战、为之奋斗的原因……我们不是为战而战,而是为了从旧世界里建出一个新世界。”

黄蜀芹是一位扎根上海的成就卓著的女导演,作品屡获国内外大奖,曾执导《青春万岁》《超国界行动》等电影,以及《围城》《孽债》《承诺》等电视剧。2016年3月荣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写意光影织梦境:黄蜀芹》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编著,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1.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从小不爱讲话的黄蜀芹,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了电影。起初是父亲,常常带着几个大孩子一起去安福路一个专门放映苏联电影的地方看电影,后来黄蜀芹就单独行动了。

那时候,父亲给黄蜀芹买了辆自行车,还亲自教会了她骑。那一年,她家附近新建了衡山电影院。于是,每到礼拜天,黄蜀芹就骑着车往衡山电影院“飞”。当时电影院总是放很多苏联电影。黄蜀芹疯狂地迷上了《钦差大臣》《白痴》《乡村女教师》……每部都看,一个不拉。看完回家后,还躲在房间里写观后感。

高中快毕业时,黄蜀芹很纠结。她学习成绩很好,考个理工科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她喜欢电影;她知道如果自己有些木讷,学不了表演,她想做的是导演。父亲就是导演,她知道导演需要做些什么,从小耳濡目染,导演、演员、摄影和编剧等等,这些工作她都很清楚;只是她感觉到,父母内心心里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去搞戏剧或电影,他们有时候甚至不希望孩子们去他们工作的地方。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黄蜀芹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不是做导演的料:“我这副倒霉样儿,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搞艺术的那种人,说出来,别人肯定要笑话。”所以,一直憋到最后一天,没有办法了,黄蜀芹一个人躲着哭了半天。父亲发现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怎么回事?你哭什么呢?”黄蜀芹还是哭,不过总算鼓起勇气跟父亲说了:“我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

当父亲面大哭一场后,黄蜀芹却如释重负。她不纠结了,学电影,这是她的决定。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黄蜀芹的父亲很平静,没有责备,也没有反对,只是说了句:“那你去打听一下,北电今年是不是招生?”

很可惜,1957年,黄蜀芹高中毕业那年,北京电影学院不招生。于是,黄蜀芹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参加高考,另一个是选择下乡。为此,黄蜀芹的班主任上门来做思想工作,学校不希望学习成绩这么好的学生放弃高考。可一旦决定的事,黄蜀芹是不会放弃的。为了再等一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也是为了学电影做些准备。当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鼓励年轻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黄蜀芹真心实意地觉得自己需要改造,力求改变自己在优裕生活环境中长大不会劳动的状态。而且,她也特别虔诚地相信,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了将来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她主动向里弄领导提出申请,要求下乡劳动。

1957年秋,黄蜀芹带着简单的行李,骑着自行车去了上海嘉定马陆。因为是自觉要去体验生活,所以,她没有觉得很压抑,反而很快乐,很有意义。一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了。可是,黄蜀芹竟然对父亲说:“下乡才一年,好像时间短了一点。我在乡下再待一年,行吗?”黄佐临总是支持孩子们自己做出的一切决定。于是,黄蜀芹又在乡下劳动了一年。

1959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试提前在四五月份进行,上海不设考点。黄蜀芹独自一人坐火车到北京,借住在表舅家。文化课的笔试,语文、历史、常识之类,对学霸黄蜀芹来说没什么困难,对她来说,最难的应该是小品表演。黄蜀芹利用住近水楼台之便,考前找妈妈的学生临时补了补课,排练了一下小品。这就是最大的专业准备了。直到很久很久之后,从事影视编剧创作的妹妹黄海芹还一再再说:“我很佩服老大的,毕竟,她从小那么内向,不爱说话。学电影,即使是导演,她也要表演小品。这件事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大的突破。”

好在黄蜀芹的小品表演顺利通过,接下来的文化考试就不在话下了,她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曾经有人说,黄蜀芹能考入电影学院,是因为有个戏剧家爸爸。黄蜀芹倒很坦然,她坚持一贯的有一说一的态度:“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托了人。但我总记得爸爸对孩子们的教育,凡事都应该靠自己。”

写意光影织梦境

沈一珠 夏瑜

